

二十世纪文库

新发展观

〔法〕弗朗索瓦·佩鲁 著
张 宁 丰子义 译



华夏出版社

新发展观

JIJI WENKU.

〔法〕弗朗索瓦·佩鲁 著
张 宁 丰子义 译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责任编辑：夏建民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y

Francois Perroux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aris, 1983

新 发 展 观

〔法〕弗朗索瓦·佩鲁 著

张 宁 丰子义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72千字 插图3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 000册

ISBN7—80053—040—X/B·008

书号：2484·008 定价：2.05元

发展——走向何方？

哲学与发展理论

哲学？发展？它们是怎样联系的？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传统的联系？多方面的考察表明，确实存在某种基本联系。首先，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已认识到思想产生于矛盾，而发展这一概念恰恰造成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向往进步但又对其后果心存疑虑。其次，对整个发展问题的看法同时就是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钥匙，反过来，这种看法又以一种批判的、建设性的方式反映着一种必须视为从对现时代的合理认识中萌生的要求，它在人类于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所面对的惨淡前景中向我们投以一线光明，或者说，它象征着一种未来模式的最初收获，这种模式将塑造我们的潜能，以适应我们的目的。

哲学家本人又怎么样呢？他在今天能够起什么作用？简言之，他的作用就是在一个思想和活动都受到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极大束缚的领域内，不畏艰险，力图证实知识成就的启迪价值。对于经济学研究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理论进行分析，是哲学家解释性工作、尤其是哲学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哲学活动的意图和哲学探讨的目标，与其说是强化某种真理的公式，不如说是澄清研究的意义和方向，因为这种研究象“无所不知和一无所知”一样，特别容易滑上“机会主义道路”。问题不仅在于对

发展研究中的偏向进行批评，尤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不懈的警惕，因为普遍渴望并赞成的发展，并未改变“暴政常常有一个愉快的开头”这一事实。

没人比弗朗索瓦·佩鲁更有资格谈论这一点，对他来说，经济学探讨不仅是一个接受现实检验的问题，还要力求论证真理的逻辑，这种真理既是认识论领域中的，也是实践领域中的；既是推论的真理，又是伦理的真理。正由于真理不受领域的限制，因而应当说，即使我们想要放弃给真理（真理绝不仅是某种象征或方便实用的常规）下定义的企图，也要承认——为表明这种困难——圣·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论述对于真理也是适用的：没人问我们时我们还觉得了解一些，一旦要努力说明它时却是一无所知！这里所说的远不是推测出来的真理、确凿的真理，也不是特定价值体系的复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受经常性反思活动的意义和知识意义所启发的活动，由此得出既是沉思的又是实用的思想，并象重视我们的理论和原理分析一样，重视我们的拒绝和抵制。处于这种条件下的思想同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活动是和谐一致的。在我们的安全无保障的情况下，这种思想给我们以力量；这种思想是一束耀眼的希冀之光；这种思想是追求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的理想所绝对必需的，没有这一理想，经济学既无法存在也不可想象；这种思想支撑着我们的愿望。它从一系列非常现实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们的愿望，当我们平静地评价这种危险的时候，会使我们把过时文明的乖戾晚年同文明本身的未来命运混为一谈。就象诗人可能做的那样，说有朝一日终会证明对开化状态所寄托的愿望是“一种被蒙昧所驳倒的徒劳幻想”，这只是说，开化状态并未被赐予所有民众。发展尚未发生：它现在只是表现为意识的急剧增长，表现为一种指望，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但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它还只是被隐隐约约地觉察到。

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术语

我们考察一下“发展”这一术语本身是否至少应对发展这种含混状态负部分责任。“发展”，既指发展的活动，又意味着结果的状态。然而，这种歧义是同另一种更根本的歧义，即根源于活力论的想象、甚至根源于历史的本质和生命科学的歧义混杂在一起的。在生命科学中，这种歧义实际上包含着对生成、变异和进化的实质的论述。

在不断重申的增长与发展的差别中，在对发展的辩解中，在对发展的“神话”、发展的“宗教”、发展的“错觉”等等东西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发展这一术语的经济学意义和它的政治的、论辩的职能，但是早在这一术语具有这种意义和功能之前，它就受着产生于两种现实之间冲突的原罪的折磨。这两种现实是：日常的现实，它具有一系列由任何事物都在成长这种观念而造成的熟悉印象；科学的现实，这种现实往往伴随着它所特有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危机和纠偏。由于这一术语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的演变既未使其意义确定下来，又没形成科学概念所必需的严格的明确性，这一历史演变反而使它背上了更为沉重的包袱。

因此，即使不去推测增长、发展、进步这些概念间的因果联系，不假设从生物学知识向经济和社会知识过渡中的逻辑关系，仍有必要考察一下这种打破事实描述和现实想象之间微弱联系而固定设置的研究路线上的各重要阶段。首先，这能使我们对相关性有所认识：发展曾被用来指增长，而增长在生物学家对生育和发展关系的早期讨论中，是与发展相对的，因而也是与“生育”的定义相对的，它仅是“规模的扩大”！其次，这能使我们对现代性有所认识，就其内涵而言，这种现代性也许同在其适用范围内

的自由落体定律一样具有深远意义；自哈维以来，发展一直是他在《动物生育学》（1651年）广为传播的理论中的一个有效概念，这个理论推翻了亚里士多德采用的根据生物的生育方式分类的原则，代之以细胞生成原则。这个原则把亚里士多德加以区分的东西作为相同的東西，从根基上瓦解了自然发生说，并为渐成说、总成说和专以生命知识为基础的生命理论开辟了道路。最后，这能使我们对在发挥19世纪进化论的过程中存在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所认识，这种复杂程度不亚于其经典形态的进化论广泛地渗透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哲学的概念中。当然，冯·贝尔（1828年）导入胚胎学的那些新概念——达尔文和斯宾塞正是由此吸取其思想的——在生物学理论和社会哲学的创立方面确实起了作用，并使“发展”和“进化”具有了合法性：进化——由于自然选择问题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发展——由于以孔德、斯宾塞及其信徒的进步概念为基础的思想的传播。先是奥古斯特·孔德，他认为进步就是发展，这是生物学赋予历史的基本规律；“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至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这里根本不存在历史是人类活动的思想：除自然规律外，一无所有。因此，发展概念在把人类进化描绘为一个没有危机、间断和更新的进程时，开始使用社会有机论者的隐喻，并认为使用这种隐喻是合理的。接着是斯宾塞。在孔德和斯宾塞之间，达尔文把戏剧事件引入生命过程，参考死来说明生，这样就产生了斯宾塞在19世纪末所选择的不同内涵。在胚胎说模式后出现了渐成说模式，所有的演变，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人及其他的产品的、还是社会及其形态的，都被视为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是，这种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是有机体同与其自身相异的行为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切进化都是渐成的，它导致结构

变化，使之从同质转化为异质，因此既是增长也是发展。大家公认，斯宾塞与对同一模式持另一种解释的马克思不同，他只采用了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中渐成说的观点，他这样做既是由于传统束缚，也是因为这能使他把他的综合同政治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协调起来，因而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于是，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大型工程方案或斯宾塞工程方案的东西，其基础是一种完全统一的知识。这种方案的目标是制定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和社会工程，它们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经验的一种特殊模式的希望。

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因此，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绝不仅是不加控制地随意扩大某些概念的应用领域，而造成它们在这些领域中定义混乱、难以把握的局面。在反神学观点的掩饰下，已经出现了一种反目的论观点。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一思想路线，它既不批判自己的手段，又不对其标准提出疑问，而只对目标表示异议；它把手段和标准接受下来，但对其本身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或解释。也正是这一思想路线，它给予列强以借口，使列强们能以其目的是推广文明为托辞来抚慰良心，从而危害了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

到今天，时过境迁，但含意仍然不清。因此才有论述方式中混淆事实与价值、混淆崇拜起源与迷恋未来、混淆对落后的怀念与传播进步的信心等情况出现。不是说过发展是西方人自我复制，不是说过世界能以不同方式发展吗？这些说法使更深层的疑问具体化了，这是一种由危机四伏的前途引起的焦虑。无疑，这种危急状况是下列事实的一个征兆：既然承认根本不可能以一种使所有国家、所有经验、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普遍方式给发展

下定义，那么也就认可了冲突情况的存在，并使之合法化。只是说发展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应经过不同的途径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多样性的差异是由什么决定的？发展的某种形式？究竟是哪种形式？什么使它成为“某种东西的形式”，它是哪种发展的形式？如果直至今日所走的路是行不通的，那么瞻望前途，似乎也是茫然一片，无路可寻。在一种魅力和优点丧失殆尽的模式和一种尚待证实其成效的观念之间，我们徘徊不定。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人们通常喜欢说的“危机”。要对人类命运问题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在必须用发展的语言来表达：为实现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共同努力涉及诸多方面，而且如此紧迫，以致同和平与生存融为一体。这里谈到的和平是世界和平，而财富的积累和在某些方面有特殊优点的生产革新和组织革新却阻碍了这种和平；引起种种冲突的经济制度正在今日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在社会的最深层次上再产生出这种最受人们指责的冲突，就这个意义而言，这里所谈的和平也是指再分配的和平。

除非证明存在着一些不涉及全球性的国际环境也可理解的政治微观系统和社会微观系统，就绝不能认为是个地区性问题；否则，对于中断过程的抵制似乎就是有效的了，它使所有发展都依附于某种同一模式的复制；否则，与一体化过程相反的运动、导致悬殊差别的活动、为世界生产体系利益考虑的国际化，早已成功地阻止了现代经济机构及其财政资源、技术和市场吞没所有人类社会。如果我们还缺少这种证明，那么，明摆着的事情就是这种误入歧途发展的证据：大宗产品输出，以国内生产代替进口，产业输出。结果是发展的危机，这是一种现实的危机，然后是意识形态的危机和理论的危机。于是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用一般公式表达的阶段。一言以蔽之，增长同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牢靠的，增长会导致

发展的观点更是如此。我们要记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八亿赤贫的难民！但是，问题的这种普遍性还是需要证明的。质疑的言语有助于此。但这不是太戏剧性、太不公允、太片面了吗？早在20多年前，弗朗索瓦·佩鲁就产生了怀疑。这种质疑的预演往往同下列问题相关联：“我们怎样才能改变我们面前的社会和文化，使之符合我们的工业化？”要不就是值得以注入大量慷慨行为来充实的增长。虽然社会与流行的模式不同，这一事实似乎成了发展的障碍，成了“危机”的原因和理由，但这种贫困的理论并没有掩饰住这种理论的贫困。关键在于，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普遍的危机，不如说是与国际舞台性质有关的普遍性现象。

仍然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既然如此，这种普遍的危机就是世界性的。但这是在一种新意义上说的，因为它不是持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而是该过程的中断。一方面，我们经历着一体化、国际化和普遍化；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它们势必带来个性化，从而导致差异地区的出现和协调统一的需要。这些对立的运动不是同一运动中的对立部分。它们表现出潜在的普遍性，但这不是由于它们活动的场所是同一个世界，也不是因为某地发展不足和别处发展过度是“恶性发展”的互补方面；关键在于，所需要的解决办法必须是适当的全面发展——换言之，必须是制定与当今世界相吻合的政治和文化蓝图，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不得不担负起那些自己能够适当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任务是和人类能够有效说明并加以解决的问题相符的。当然，这只是对危机的一种主观认识，是从危机（就业、城镇、石油等危机，富裕时代的结束，

普遍稀缺的进一步恶化，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困化）令人厌恶的方面推断它的极限。总之，尽管犬儒主义教导我们说死亡甚至也是可行的，但如果工作与尊严的人权有些什么意义的话，我们在其中生活的充满着冲突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可行的世界。不言而喻，无论我们抵制人的消费，还是不再能满足人的需要，这些挑战都依然如此。我们抛弃的或不再能提供的东西，都要求我们批判这种教育模式，批判科学和文化观念，批判政治意向。这里，青年人对解放、人权、和平的自发思考是同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及当代思想家们的忧虑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运动与运动是相联的，因而这一危机被视为在事物的秩序中，在它所酿成和控制的过程中一个危机。这一危机还被视为对其合法性的挑战，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在这种危机中，现行的普遍性受到了另一种普遍性的怀疑和挑战，而后者正是统一性促使我们要求的普遍性。此外，这一危机也是现代性的危机。长久以来把历史描绘成一个统一过程的言论和许诺现在暴露了真象；曾经攫取了失败者的财产、现在虎视眈眈要攫取他们的灵魂的，正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偶像破灭了：贫困和暴力使它成为弥天大谎。但这种偶像还很有市场，因为人们还在强调一种平衡的、有差异的增长观，据说这种增长可与有机体的增长相提并论（而且可与经过自然选择所形成的生物有机体的增长相提并论^①，……仿佛世界的状况是自然历史的产物）。结合——解体的过程好象完全排除了为发展提供牢靠的基础或发动一种新的世界性运动的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意向，按照这种意向，新的世界性运动就象未来的计算机一样，它的思维与其说是连续式的，不如说是并列式的。这种运动象即将出现的“多维历史学”一样，其年表将采取并列的形式，而不采

① 参见莫里斯·拜伊-G·德斯坦·德·伯尼斯《国际经济关系》，第4版，第1020页。

取将各种历史学放入同一个模式的形式，因为同一模式无视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以及在明天的普遍性中将趋向统一的各种不同文化。

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弗朗索瓦·佩鲁决定把有机论隐喻试图掩盖的东西概念化，我们要感谢他在认识上的敏锐，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没有提供的东西。

他的努力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展开。

第一个步骤是把增长、发展、进步和社会进步置于一个能澄清其意义的领域内，这个领域就是被认为是科学的、以科学作为发展方向的经济学。并非所有隐喻都应抛弃，但确实存在一些阻碍并窒息思维的隐喻；其他隐喻则有一定启发性。在这种重新思考的尝试中，问题不在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而在于把它推向前进。下面这个目标是比较微妙的：要在脱离事实的想象与没有理论论证的事实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我们所以要步入经济学领域，那是因为它能成为开明的决策和活动的舞台，这种开明依靠的是知识。经济学也是一种活动方式，这种活动已成为科学研究和持续的批判性分析的对象。

同差不多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天真一样，经济学家公认的日益增长的天真，曾令人感到痛惜。有人曾建议他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社会学。还有人劝告说要求助于逻辑。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从字面上说，不采取一种特殊方案，对可观察的事实作出解释、加以证实，并使之形式化；如果不使表达方式与经验彼此吻合一致，这种劝告也就不能付诸实现。这种概念的灵活性必须包括一切造成或说明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东

西，这种灵活性比语源学更重要，比语义学更起作用，比纯粹的哲学更有效，其目标在于以理性的方式把握经济现象。因此，分析的中心是现实力量的领域，能动单位在这个领域中彼此对抗，它们是经济活动的个别主体或集体主体。

这个领域的特征是权力无所不在；这个领域的特色是不平等伙伴之间的关系和不对称。观察是对当时的逼真描述，它准确地再现了历史学所反映的但未说明的一系列资料。历史学之所以有某些价值恰恰在于它提供的资料本身！它使读者在看弗朗索瓦·佩鲁的著作时可以从清晰理解的那种分析更为完美。它给通常具有几个方向的增长又加上了时间这一方面；因为经济的现实即使被简化成描述性的指标时，也依然是现实“时空”中的一个资料数据，这种时空的空间是有限的，时间是流逝的。它最后是以分析结构变化、组织类型和社会前进经过的路线而告终。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同增长保持着差异，但又围绕着它，并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显示出自己的效益。果真如此，经济学就不再是一门关于物和物之间关系的科学，而成为一种竞争性共谋和合作性冲突的实践。这种竞争性共谋与合作性冲突并不同于由价格机制调节的均质市场的组成部分，这正如它不同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所说明的拼死搏斗和为名誉而进行的斗争一样。于是，弗朗索瓦·佩鲁就假设了一条基本公理，作为以科学为方向的经济学的原则。这条公理是：生命是抵御死亡的各种力量的结合体。

科学和价值的趋同

由此可见，在这里，科学不仅与常识相符，而且与真知，即人民真正的认识一致。正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人民曾受到

愚弄，消极地接受那些不仅从未以其自身经验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且是由西方人向他们灌输的思想、公式和战略”，还强迫他们服务于那些占有财富的强国的目的。因此，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8月27日至31日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的会议感兴趣，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在这些概念中，内生性也许最为困难。这个概念表示的是运用各国的国内资源，基本含意是要注重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能精确计算的价值体系。这一概念正视秘而不宣的真理，它意在指出，如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如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在空头支票的掩饰下对他们进行剥夺，发展就不能发生。发展在于成就、实现和解放，它不是个悲观论者和乐观论者之间那种学究式争论的话题：对于这种运用知识、发动一个更有益于实现人类理想、更能与科学的各种要求协调一致的运动所进行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斥之为不现实而弃之不顾。

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可把发展视为引起知识和价值创造的张力焦点，促进和推动这种创造活动正是教科文组织的职责。

从事这一事业，必须通过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因为，发展不是自发演变的结果，也不是在共同利益方面有一致认识的结果，更不能把它简化为实现专家们设计的各种模型。所以，发展远远超出了满足人类需要这一简单的道德要求。虽然其中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发展，但它肯定是竭尽全力奋斗的成果，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来自现实的限制和来自真理的限制聚集在一起。

对所有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对经济学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依赖知识体系的自我意识的要求。知识体系通过这种自我意识可以反观自己的基础，并同其他知识体系结合起来，对自己基本原理的相对性和由于天真而受各种权势影响的程度作出估价。努力进行批判性的再评价，有助于我们看到支配认识活动的条件，并能提醒我们，现实无法逃脱真理的把握，但必须有一种严密的研究方法。因此，如果明确指出旧的发展哲学是同已不复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对于支配着新发展的可能性的各种条件进行认真的思考，是知识界一项令人振奋的事业。我们面前的现实确实需要这种思考。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提醒我们，这种新发展根本不同于以环境为根据的外来命令：它是使自由能够成为现实的各种新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观念。这就是弗朗索瓦·佩鲁坚定不移地奉献给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对于这种思想能够全力以赴、身体力行，它将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新世界。

M·A·西纳索

1981年10月28日

（本书发表的看法完全由作者本人负责，未必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前 言

自上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力量的重新组合产生了连锁反应，它要求对思考经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进行反省。产生于欧洲的许多学说遭到社会下层人民的批判和抵制，他们现在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表达长期以来以怨恨和沉默的方式孕育的反抗态度。随着不再心甘情愿被遗忘的普通人民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各种思潮在不可逆转的广泛意愿刺激下层出不穷。

在探求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新发展问题的过程中，这些思潮具有各自的形式和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我以补充报道最近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的专家会议^①的形式来写的，正是这种新发展问题。

我没有回绝这项任务，尽管我清楚地意识到落在我肩上的重任，知道为发展哲学写一篇导言是件颇有风险的任务。虽然30多年来，我一直在对发展进行描述和分析^②，但我仍希望，我不会由于毫无根据的推测而受到指责：我的目标是为世界各地很多实力雄厚的研究团体所取得的成就作出自己一些微薄的贡献。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每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才能对自己以往的作为感到问心无愧，并证明自己所选择的学科能够胜任什么工作。

我个人的信念是，对发展问题的注意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

① “研究综合发展观”的专家会议，基多，厄瓜多尔，1979年8月27—31日。

② F·佩鲁，“从国民的贪欲到人类经济”，载《第戎社会周刊》，1952年。

用的分析工具领域中的各种根本变革。其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一旦接受了发展的观念，就可望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在历史上，这些价值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行为和活动的。

要求一种不同发展形式的呼声，出现于各种发展战略没有产生其预期结果的时期。^①虽然第一个开发的十年确有成就，但第二个十年却没有达到其目标：既没有达到6%的增长率，也没有实现正式援助的总量（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1%用于总援助，7%用于正式援助），也没有进行有效的行动合作。

这种新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这三个术语中，每一个都有几种含义，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也不会产生一个单一含义。此外，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彼此矛盾的解释。

在经过分析确定这些术语的含义前，不妨先指出这些外在的困难。

整体的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这一术语当然适用于具有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各种实体，如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集团或整个世界。

按照数学的常规用法，**内生**的是指组成选择的方程系统的各种变量，它是同表示数据并可进行不同逻辑处理的外生变量相对的。但是，在各种国际组织的词汇中，这个形容词被用来表示一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计划（1977—1982）》，《超前思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今天和明天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1977年，《自杀还是生存？（2000年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集体著作，1977年。

戴格·哈马斯库德：《报告》，为联合国大会第七次特别会议而准备，1975年。